

新世纪国学热的发展

○ 陈来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等职。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等称号。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领先水平。

我想从文化现象入手，从文化事件入手，不是依照逻辑的顺序，而是按照历史的序列加以叙述，来提出我自己对新世纪以来国学热的观察，以此与大家进行交流。

儒藏编纂

在最近十年的国学热中，第一个事件我想讲的是关于“儒藏编纂”。2002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都提出儒藏工程的计划，2003年教育部正式发布儒藏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由北大牵头，儒藏项目后来在国家社科基金也得到重大项目立项支持。这项工程后来在几个大学的发展各有不同的方向，如北大是以中国的儒家经典与文献为主，人民大学则以东亚、海外为主，汇编日本、韩国、越南历史上的儒学文献，四川大学则结合自己的宋代古籍整理计划进行。儒藏的编纂工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便有“子藏”、“子海”的规划，如山东和上海这类项目的立项，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总之中国文化经典或者国学经典慢慢成为学界的热点。总体来讲，从2002年开始这个“经典汇编”现象可以作为我们判定近十年国学热的第一个起点。国学为什么现在很热？必定由很多因素促成，其中一定跟中国崛起、经济发展、国民文化自信的增强有关，和社会对文化的需求、认识有关系。而经典汇编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建设。所以我想说，国学经典汇编热，是这一波国学热的一个具有起点意义的文化事件。

甲申宣言

第二个事件就是“甲申宣言”。2004年9月的“甲申文化宣言”，是由许嘉璐、季羨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倡导并发起。其中季先生、任先生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态度，杨先生和王

蒙则代表了更广的中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这个宣言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事实上，这个事件也遭到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把它和1935年的本位文化宣言抽象地联系起来，更多地是来自于自由主义观点立场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表达了批评者自己的意见，但是都没有真正了解到这个宣言发起的意义和立场，即：在新的时代，也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在一个多样文明共建的时代，中国文化怎么确立自己的文化态度，从而怎样正面回应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明对话的一个基本立场。如上所言，这个宣言其实反映了政府、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面对全球化挑战时对于中国文化的“共识”。这事件其实也是面对全球化和文明对话挑战时，所表达的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普世价值的一种共识。这与1935年的情况不同，跟自由主义立场上所提出来的问题方向是不相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宣言的宗旨延续发展到去年的尼山论坛。尼山论坛是面对全球文明对话的一个国家级论坛，由文化界主导，政府也参与表达。这个论坛突出“文明对话”，在我看来，就是希望能够在全民文化共识基础上，表达对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态度。我们对此应该予以积极的肯定，这是关于“文明对话”的第二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学的文化自觉。

国学普及

第三点讲“国学普及”，在2006年以前，在社会层面，国学的教育和普及有很大的发展。如北京大学，不同的院系都开办了国学班，哲学系、历史系、

光华学院……很多院系以及与外单位合作的一些国学讲习班在北大校园风风火火地开办。学生来自于各个方面，有来自媒体、企业界的，也有来自各种专业技术行业的，结果有的人在北大连续不断地参加国学班学习，参加一次不够，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变成了五六年里不断在北大念国学班的常客。这个现象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民族文化补课、学习的一种强烈需求。

从国学普及的方向和线索来说，一条线索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虽然国学班的开展是在各种各样文化需求的共同推动下，而并非由政府主导的，但是由于社会各个部门的参与，使得国学班相当流行，各个省市都非常多。就具体形式而言，有的是以诗词诵读为主，有的以儒家经典的普及为主，如《三字经》、《弟子规》，也有一些是以儒家正典为主，如《四书》，甚至还有《五经》。总体来讲，从校园内的国学班、社会的经典诵读班发展起来的大众学习，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再学习运动。于是推动国学普及的层次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是县市政府部门所组织的。就国学普及的内容而言，一方面是知识性的普及，这个方面大家需求很大、积极性很高——当然这个需求来自于各个方面，企业家有企业家的需求，媒体界的朋友有媒体界的需求——总体来讲是文化知识上的一种补课；另一方面是道德的教化，特别像国际儒联所推动开展的儒学普及活动、儿童国学启蒙活动、初高中国学教育，注重加强我们德育上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共同推动了今天整个国学普及的自下而上的

发展。

有关国学普及的另外一个方向，除了刚才我讲的国学班、大众诵读这样一条线索外，从2006年开始，主流媒体也参与进行推动。2006年1月，《光明日报》建立了国学版，它本来的宗旨不是写学术文章，而是写给大众看，写给普通人看，所以国学版的初衷和整个方向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文化传播，这与自下而上“国学热”的推动，对国学知识进行普及的目标是一致的。到了2006年10月，由中央电视台跟于丹女士合作，讲论语与人生，燃起了我们最近五年《百家讲坛》的发展，这个意义也是相当重要的。中央电视台的这项工作得到了社会非常热烈的响应，后来成为这几年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普及的一个先锋，带动了媒体对国学热的文化参与。主流媒体参与国学热，这个作用非常大。2009年国学普及又慢慢向青少年发展，在央视2频道《开心辞典》栏目推出了“开心学国学”，这个活动选择在暑假播出，是面向青少年的，追求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德育的养成，这跟整个自下而上推动国学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这一波国学热是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样两条线索的交叉推动所形成的，而社会与民众的需求是推动国学热的主导动力。

国学机构

第四点，关于“国学机构”。其实，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就率先转型为国学研究院，但未引



图片来源：CFP

浙江嘉兴：小学生着汉服学国学

起社会的注意。此后国学机构渐渐增多，首先是2005年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开始运用国学学科的方式进行国学教育和推动国学研究，这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和议论。其次是2009年清华大学重建国学研究院。老清华国学院是中国现代国学研究的标志和典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重建自然引起了海内外的特别重视。除了国学研究机构推进研究以外，国学院要把学科性质的发展带进学校来，也引起了对现有体制的一些冲击，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学要不要成为一级学科，这个话题的讨论也是2009年以来在《光明日报》的参与下进行的。而国学学科问题的讨论，含有对西方学科体系的某种质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除了体制内的国学机构外，体制外的民间国学教育机构也建立了不少，体现了民间对国学教育发展的热衷。

以上是从经典汇编、文明对话、国学普及、国学机构四个大的方向和事件，粗略地概括一下近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一些文化现象，提出对其意义的一些理解。

孔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后谈一点，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应该说任重而道远，还要走很长的道路来探索。如果就文化事件来讲，新世纪有三个和孔子有关的文化事件，一个是孔子公祭，一个是孔子电影，一个是孔子塑像。纪念孔子诞辰公祭大典2005年9月在曲阜孔庙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公祭，在海外影响很大。一个就是孔子电影，孔子电影的出现，从对电影的积极反应来看，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

④



“国学热”引来社会热议

国社会文化对于孔子的共识。如果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在20年前从方向上其实已经解决了。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秋天作了关于孔子的讲话，他讲的方向是明确的：第一句话，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个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自豪；第二句话，他说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第三句话是，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引自谷牧《我对孔子的认识》）。这就从方向上明确了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怎么对待孔子的问题。孔子在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在近百年来中华文化重建中形成的地位，使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因此我们对于孔子的态度要非常慎重。但遗憾的是，今年孔子塑像一立一撤，引起大众关注，海外一片哗然。其实孔子像的位置根本不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而一些同志还根本不清楚孔子像的位置就大发议论，是很不负责任的。对这一

文化事件发表意见的人很多，从媒体误导、愤青心态到“文革”遗风，都参与了对这一事件的议论。我始终认为孔子塑像立在国家博物馆是积极的，而且从一开始我就肯定，在政治上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标志。就其结果而言，则不能不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曲折。但从整体上看，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人民对民族文化的信心不会减弱，人们对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信心不会动摇，文化界和广大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守护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景是持乐观态度的。📖



2005年9月28日，山东曲阜纪念孔子诞辰2556周年，首次实现全球联合祭孔

链接

国学之定义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对国学的统一定义。钱穆《国学概论》有言：“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于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阐发。其用意在使用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时贤或主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亦难兼备，并与本书旨趣不合。窃所不取。”钱穆这个说法是把国学主要限制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上。章太炎则认为国学由三点组成：“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

综合而言，“国学者，本国固有之学也”。即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是中国传统学术。如果以学科分，可分为哲学、经学、史学、文学、政治学、宗教、艺术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因此，国学又可以说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国学之主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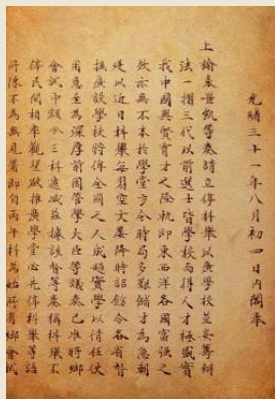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国学之主干为经史子集，其他都是由此而发。其中“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史”是历史典籍；“子”是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集”是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中国古代图书分为四部，即“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被确定下来的。清代乾隆帝编修《四库全书》时，即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钱穆指出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钱穆先生所说也便是国学最基础书目。

儒学所维持的乡村制度

儒家思想教育体系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古代印刷业的发展，

产生了一批定居于城市，专门以编制、评点考试资料为生的读书人，同时也刺激了乡村私学的发展，为广大儒生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谋生手段，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识字率达到惊人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此体系塑造了广大儒生固定的生活模式——耕读模式。他们一边教书，准备科举考试，一边种地养活自己与家庭。儒家思想得以代代相传，薪火不止，从而为乡村生活提供了一整套礼教资源，有效维持了中国古代乡村的社会秩序。

清廷废科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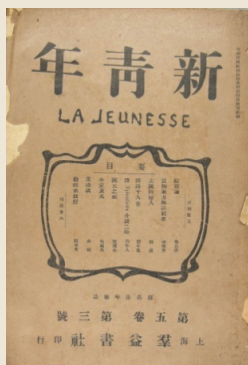
《上諭檔》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的亡国危机，迫使清廷在1905年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纸《上諭檔》，断然中止了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作为朝廷政治与伦理统治之“纲目”，顿时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广大儒

生无法通过正常考试途径进入国家官僚机构体系，“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科举制的废除，意味着传统中国立国之本的消亡，也意味着旧中国的寿终正寝。

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在中国文化界，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清算传统文化的革命运动，核心人物为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



爱情缩小。”

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对传统儒家思想可谓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为以后历次文化革命运动之滥觞。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提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必须全盘而彻底地否定中国传统，其实这本身就违背了他们所推崇的自由主义原则。

现代新儒家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西化思潮在中国广泛蔓延，风起云涌。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学者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名理学为特征，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点是从儒学内在目的性开出“新外王”，即科学和民主，达到“内圣而开出新外王”。他们坚信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仍有价值，乃人类思想永恒的追求，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条件下的出路。此学术流派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以区别于孔孟“原儒”的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其学术思想自我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他认为，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

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



为，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尝到“人生的真味”。他与熊十力、马一浮合称为“新儒家三圣”。

戴震

戴震（1724~1777），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字东原，一字慎修，号杲溪，休宁隆阜人。治学广博，涉猎多种学科，曾参与《四库全书》的编撰。他抨击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其视个体为真实、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胡适称之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

欧文·白璧德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美国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启蒙时代，卢梭等人提倡浪漫主义思潮，主张打破束缚，放任自我，弃绝典章制度，复归自然。白璧德坚决反对此种思潮，反对浪漫主义，相信伦理道德是人类行为的基础。他抨击了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批评了想象的过度放纵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呼吁节制情感，恢复人文秩序。这是新人文主义的基本倾向。白璧德对东方哲学，包括孔、孟、老、庄与佛教等都有深入研究，梁实秋、梅光迪、吴宓等都曾受教其门下，深受其影响，使得新文人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代表作有《文学与美国大学》、《新拉奥孔》、《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卢梭与浪漫主义》等。

学生记者 宋陈宇整理